

文稿

意欲與抑鬱：  
從精神分析觀點看〈離騷〉、〈遠遊〉中的命令句式<sup>1</sup>

金儒農\*

一、前言

兩千多年來的屈學研究中，圍繞在屈原的人格、行為上的研究始終不輟，彭紅衛、周禾就認為關於屈原的人格研究略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自漢初迄清末，歷代學者雖沒有用「人格」一詞來評論屈原，其人的性格、氣質、能力、品行等多有闡發，並集中在忠君愛國的倫理層面，這些其實都有觸及了「人格」的某些層面。第二，自 1906 年王國維開始將西方心理學「人格」概念導入屈原研究，開心理學意義上屈原人格研究的先河，更在五四之後有許多學者導入科學化的研究方法來處理屈原的相關議題。第三，80 年代以後，文化熱和方法熱的興起，學者紛紛用人格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屈原進行更深入細緻的微觀研究和宏觀審視，與 90 年代的中青學者觀點結合，從而得到斐然的成績<sup>2</sup>。

在這些從文本分析屈原的人格、行為特徵的研究中，佛洛伊德首創的「精神分析」觀點成為相當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一方面符合了時代趨勢，特別是精神分析中蘊含的現代性成份讓它得以出現在跨學科領域之中，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傳統文學批評的革新，意圖將文本恢復到作者的手上，而非詮釋者的天空中。事實上，早在郭沫若《批評與夢》中，郭沫若就有用精神分析的路數透過屈原的作品解析說明屈原「好像是個獨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確是有些變態」<sup>3</sup>，並分析其人的身心狀態，例如睡眠品質不佳、失

---

\* 金儒農，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sup>1</sup> 本論文的主要中心概念來自於吳福助老師在中興大學中文系博碩士班「辭賦學研究」課程 2010 年 4 月 22 日針對屈原的權力慾進行的闡述，吳師特別點出屈原在《楚辭·離騷》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命令傾向，啟發了筆者針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的動機，在此特別聲明並感謝吳師於此篇論文的協助。同時也要感謝匿名審查人針對論文題目與架構給的意見，筆者均勉力修改，期能更臻完備。

<sup>2</sup> 彭紅衛、周禾，〈二十世紀屈原人格研究述論〉，《江淮論壇》2005 年第 10 期，頁 107。

<sup>3</sup> 周成平，〈郭沫若與精神分析學說〉，《江蘇社會科學》1997 年第 2 期，頁 167。

眠、肋間神經痛等焦慮症狀<sup>4</sup>。此論述雖略嫌簡單，卻開啓了屈原研究的一個重要脈絡，也才讓後來的學者有更深入探討屈原其人其事的可能，例如黃靈庚〈楚狂屈原--對屈原人格個性、死亡意識的反思〉將屈原作品中所述及上天庭、追鬼神之事視為「幻視」、「幻聽」，認定屈原有精神耗弱或是精神官能症前期的症狀，而屈原在作品經常自比為美人，更被黃靈庚直指為「變態的異裝癖」。臧策〈屈原：東方的奈煞西施--論屈原的自戀傾向〉則認為屈原有明顯的自戀心理傾向，並且對其政治生涯和人格悲劇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因此常有自我理想化、自大狂、白日夢等癥候出現<sup>5</sup>，雖然文中運用的理論與觀點如今看來頗有謬誤之處，卻可以表現出那個年代學者的研究傾向。

由上例證可得知，從精神分析觀點分析屈原絕對不是一人一地之舉，而是一個隱然可見且逐漸興起的潮流。有趣的是，從上述的論文中我們雖看到論者對於屈原有著如五四時期的「疑古」傾向，但也可以發現他們有別於以往的研究傾向，進而取消屈原的神格化、英雄化，希望能將他恢復人的面目，從而讓現代人更為瞭解屈原的人格與性格。故而本論文意圖承襲並修正這種分析觀點，對屈原的作品進行細部且審慎的解讀，並透過精神分析理論來理解屈原的心理狀態，藉以建構一個溝通平台，恢復屈原在當代的生命力。

## 二、精神分析中的命令語觀點

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人的意識與語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佛洛伊德曾經指出，「語詞表象(word-presentation)是心理欲力經過繼發性壓抑之後，一種高度貫注(hypercathect)的表現。雖然愛的對象(love-object)遭到放棄，以壓抑狀態持續存在無意識之中。但是，心理作用會在前意識 (Pcs)系統尋求語言表達的貫注，通過與語詞知覺的連結，而獲得成為意識的可能。」<sup>6</sup>因此，一個人的語言即其心理意欲之表徵。在佛洛伊德的早期研究

<sup>4</sup> 郭沫若，《屈原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102-105。

<sup>5</sup> 以上兩篇論文均收錄於郝志達編，《東方詩魂》（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sup>6</sup> 佛洛伊德，楊韶剛等譯，〈論潛意識〉，收於《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台北：米娜貝爾出版社，2000），頁 356。

中，如何透過語言來探測人的潛意識便成為了重要的論述基礎，其中，透過對於「失誤動作」<sup>7</sup>的研究，我們可以略窺精神分析對於語言和意識的關係的觀點。在佛洛伊德的觀點中，所謂的口誤其實是「想說某些話的意向受到壓抑」，換言之，每個人的語言都需要透過意向的傳遞才能具備其要件，而當這個意向其實受到另外一個相反的意向壓制、牽引或抗衡的話，就會在語言特徵上暴露出來<sup>8</sup>。拉岡更繼之討論，認為「語言其實是主體捕捉失落對象，壓抑之後進而昇華的象徵性行爲。換言之，它可說是失落對象的一種替代性形成」<sup>9</sup>。在這些理論中，精神分析都認為語言標誌了人主體的失落與不足。

在失誤動作的研究後，佛洛伊德曾經針對他外孫在母親外出表現出的行爲做出一個經典的分析，當時小孩正在不斷地重複將線軸丟進吊床裡繼而拽回來的動作，同時在拋出去時口中喊「Fort」，拉回來在看到線軸重新出現時喊「Da」，這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遊戲，也就是「消失」與「再現」。在佛洛伊德的詮釋中，他認為孩子所玩的丟線軸遊戲，的確顯露出其隱藏內心深層對母親離去的焦慮與不安。處於焦慮不安之中，他只好藉由遊戲得到補償。雖然母親不在仍舊讓他不安全，但在重複丟線軸的遊戲中，他卻能夠主動地主導線軸的來去，不像在現實中無法掌控母親何時離去或回來<sup>10</sup>。佛洛伊德將這種行爲定名為「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這種行爲發生在我們的意欲有所空缺的時候，透過強迫性重複這樣的循環行爲，讓我們的意識得以回復到「快樂」的狀態。這同時也幾近於「生之本能」與「死之本能」的抗爭過程，在這樣的互動之下，一種病態性的不斷地重複就展現出來了。

從「強迫性重複」出發，可以發現的是，這個理論所依恃的是在於「意

---

<sup>7</sup> 此處的失誤動作，指的是人做出了違反他的意識的行爲，例如口誤、誤讀，或是暫時性的遺忘，或是將東西錯置，都是失誤動作的一種。

<sup>8</sup>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左岸出版社，2006)，頁 94。

<sup>9</sup> 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頁 394。

<sup>10</sup> 佛洛伊德，楊韶剛等譯，《超越快樂原則》(台北：米娜貝爾出版社，2000)，頁 43-45。

欲的空缺」與「重新掌握主導權」的連帶關係上，串連他們的則是「命令句」的形式（「Fort-Da」並不只是單純的小孩呢喃，而是帶著權力意欲的命令語）。以這個觀點來看屈原的〈離騷〉，就可以發現在辭章的中段部份一反前面的憂鬱失志，反而躁動地出現的諸多命令句並非只是單純的權力欲展現，而是更為深層的強迫性重複行爲。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理解〈離騷〉與〈遠遊〉的類同，其實也是因應這種心理狀態而必然產生的結果。

### 三、〈離騷〉中的命令句解析

在屈原的眾多楚辭作品中，其中以〈離騷〉最具知名度，但也最難讀，清朝朱冀稱其「如海若汪洋，魚龍出沒，變態萬狀，令人入其中而茫無津涯」（《離騷辯》），吳福助則延伸具體討論，認為〈離騷〉「有紀實，有幻想，時而寫人間的實事，時而又寫天上的幻景，中間穿插各種神話、傳說，寫得光怪陸離，波譎雲詭，初讀似若不可測其端倪」<sup>11</sup>。事實上，如果我們細讀〈離騷〉一文，可以發現，這篇辭之所以難讀，並不在典故艱澀或是用字冷僻，而是在於作者強烈的自我意識，通篇都從自身出發，寫來慷慨激昂，如長河入水浩蕩不可收拾。也因為這種完全不在乎讀者在哪裡的創作姿態，讓我們得以透過耙梳作者的字句，來討論推敲翻揀其背後的意義，從而看出屈原創作之時的心理狀態與意識。

根據吳福助的分析，〈離騷〉一文約略可分為三段：第一段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豈余心之可懲」，是文中主角對於其平生的回憶與反省，並表達了他有壯志難伸、徒被小人所陷的痛苦。第二段自「女嬃之嬋媛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前半段先假託與女嬃的應答，表達追求理想的信念，後半段則以浪漫幻想的手法鋪陳出上天入地的尋訪理想之途，可惜並未有所得。第三段自「索藁茅以筵篲兮」至結束，則是透過主角問道於靈氛與巫咸，得到的都是遠遊以待明主的建議，因此打算要離開楚國時，卻還是因為眷戀而回到了故國之土<sup>12</sup>。在第一段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雖

<sup>11</sup> 吳福助，《楚辭註釋》（台北：里仁書局，2007），頁3。

<sup>12</sup> 吳福助，《楚辭註釋》，頁3-4。

有怨氣卻仍舊孤挺的人臣，在表達對小人的憤懣與不齒之餘，仍舊不斷地要求自己的品德，反求諸己，一日三省，文中充滿的盡是自勉話語：「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到了第二段與女嬃講完話、也與舜傾訴心聲後（「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中正」），獲得默許之後，就要四處雲遊找尋理想棲身之地，一開始還是自己駕車（「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餘上征」），但沒多久到了崑崙山中層的縣圃後，開始顯示他的領導慾望（「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開始），傳達出一連串的命令，與前面的謙沖自牧完全不同。這樣的情緒反應也可以在第三段中看到，主角與靈氛、巫咸對答的時候，也只是在哀嘆自己的時不我與，與埋怨君主不重用他。而決定遠遊之後，自「為余駕飛龍兮」開始，又是一連串的命令句。

要特別說明的是，本論文的「命令句」採取的是直接命令的定義，亦即「命令他人為自己作某件事」，也就是意圖要透過命令他者的過程，得到自己需求的結果（但不一定會達成）。細探文本，諸如「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吾令帝閭開關兮」、「吾令豐隆乘雲兮」、「吾令蹇修以為理」、「吾令鳩為媒兮」、「索薹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為余占之」等等都算是命令句式的一種<sup>13</sup>。在這裏，筆者打算從兩個方向來探討命令句在〈離騷〉中的意義，一個是命令時的情境，一個是命令後的反應，而這兩個部份結合在一起，方才可以看出屈原展現這些命令句的動力來源。

從命令情境來看，〈離騷〉的命令句都發生在主角找人訴苦，獲得寬慰、勸解之後，也就是說，當主角透過言說，確立了自己的處境的确是相當的失意、需要遠遁以尋安身之所的時候，生命當下的空缺就被凸顯出

---

<sup>13</sup> 至於「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餘上征」、「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雖然也隱含了命令意義，但命令的行為並不明顯，故此處不談。

來，因此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所感受到的焦慮，就必須透過命令句來宣洩，而這個命令句總是直接明快(幫我開門、幫我開路等等)，也反應出作者在創作之時內心滿滿的怨懣需要馬上立即地宣洩。而命令後的反應則顯得更為值得注意。其實在〈離騷〉內主角發出的命令句，只要是為了替自己找到一個安身的地方，如要求帝閭開門(「吾令帝閭開關兮」)、蹇修做媒(「吾令蹇修以為理」)，這些意圖不在命令本身而在命令傳達出之後需要別人完成的要求，都不會被完成，所以帝閭只是斜眼看看主角(「倚閭闔而望予」)、而蹇修也並沒有完成任務。這個形式其實很有趣，就好像「Fort-Da」的句子只發出了「Fort」而沒有用「Da」作結尾，是一個未完成的心理機制，意欲已然宣洩而出，但並未獲得回應。從佛洛伊德的眼光來看，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因為強迫性重複就是在基於一個「必然回應」的前提而施行的，透過回應，人的心理機制才能得到完滿。而如今的狀態，則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在讀屈原的〈離騷〉時，經常會感到抑鬱不可解，因為那似乎也反應了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都有機會遇到的，意欲無法完成的時刻。

但從〈離騷〉的結尾來看，或許我們可以做出另外一種解讀，也就是屈原所宣洩出的意欲是一種可能，但他並不希望他只能遠遊，而有著更偉大的抱負，所以他在這時對現實應該還有所寄求，希望辭文中的意欲宣洩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回應，也就是說「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的那一個回望，是提醒自己不該將心思放在文學的創作宣洩上，而該掛心於現實，因此還帶著強烈的企圖與希望。

#### 四、結語：兼談〈遠遊〉

整理了屈原〈離騷〉中的命令句，得以理解這個詩人偉大但卻與我們有著類同的心靈，也沒有中外之分的界限。但在同時，我們不免好奇起來，如果〈離騷〉如此，那與〈離騷〉頗多相合之處的〈遠遊〉，在命令句上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吳福助的研究整理中，〈離騷〉與〈遠遊〉在精神主題上，起碼有

十點相類：詩人的自我形象、遼遠博大的襟懷、愛國的赤誠之志、對古代聖君賢臣的敬崇、孤忠難盡的自勵與苦悶、以古代聖德音樂為精神陶冶的典範、浪漫主義情愫、神奇而真切的宏觀觀念、惜時精神、曠世駭俗的想像力。吳福助同時也對兩者的藝術技巧有著類比，特別是〈遠遊〉的主角在遠遊時，「車隊行進的氣魄、景象，足以與〈離騷〉相映成輝。篇中風物、情態描述只是〈離騷〉意境的重現。」<sup>14</sup>而這種意境重現的狀況，在趙達夫來看，這種重複其實是一種接近抄襲的事情，於是他認為「根據作家心理和藝術創作的規律而言，〈遠遊〉無論如何不會出於屈原之手。」<sup>15</sup>郭沫若則是按照他原本對屈原的精神狀態的分析，認為多年持續的放逐壓力造成屈原精神恍惚、注意力游移，於是會有重複語句、語無倫次、思想紊亂的現象產生<sup>16</sup>。

但從「強迫性重複」的觀點來看，這樣語言的重複，其實正是代表主體的空缺仍舊沒有消失，於是需要不斷地重複帶有意欲的語言，以彌補自身的恐慌。不過令人注意的改變則是，那些在〈離騷〉中無法完成的命令句（Fort）在〈遠遊〉中得到了實現（Da），例如〈離騷〉不開門的帝閭在〈遠遊〉中也「排閭闔而望予」，〈離騷〉中主角求與神女共結連理的願望也在〈遠遊〉中得到了超乎預期的滿足（「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這樣在詩文中的完成，其實正代表作者對現實理想的放棄，因為已經不期待在現實生活中能滿足自身的意欲，於是只好靠詩文來抒發自身的抑鬱。換句話說，看來光輝明亮的〈遠遊〉其實正證明了詩人自己的抑鬱情結發展得更為嚴重。

承襲以上論述，本論文企圖提出一個並非疑古也非輕薄先人的精神分析可能，透過文本分析與耙梳，理解屈原的偉大之處，也理解其人格的部份形象，就此將屈原從無法直視的神人，恢復到與我們殊無二致但較為敏銳也較為堅持的詩人形象，進而理解其抑鬱不得伸的情結來源。

---

<sup>14</sup> 吳福助，《楚辭註釋》，頁 611-613。

<sup>15</sup> 趙達夫，《屈原與他的時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頁 443。

<sup>16</sup> 郭沫若，《屈原研究》，頁 117。